

我国阶级阶层研究 70 年： 反思、突破与创新

李春玲

内容提要 回顾我国阶级阶层研究 70 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固有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论,多元取向的借鉴与吸纳,本土经验的创新与深化等过程。大体而言,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可以区分为冲突论取向与功能论取向;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区分为学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概念建构和理论阐述。当然,不论哪一种理论取向,哪一种研究模式,其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了解社会分层现象和阶级阶层结构。尽管当前相关的理论争论还在持续,但其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还在推进。

关键词 阶层 阶级 结构变迁 理论建构

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阶级阶层研究既是涉及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学家采用独特的社会分析视角对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理论解说。阶级阶层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特别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其影响力超越了社会学领域和学术研究范畴,进入了社会公众视野,影响了政府决策。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变迁,阶级阶层构成及其社会分层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演变,其中的两个重要转折点把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演变过程截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截止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及其社会分层形态从社会经济极度不平等、阶级分化现象突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早期资本主义形态,演变为收入分配较为均等化,但城乡差异和政治身份分化突出的社会分层形态。从阶级分析视角来看,这一阶段的演变趋势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被消除,而政治意义上的身份差异则不断被强化。第二个阶段开始于 1978 年改革开放,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之前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逐步

分化为多元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差异更为突出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分层形态。政治意义上的阶级身份逐渐失去作用,而经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阶级阶层逐步显现。前后两个阶段社会分化方向的转变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使我国阶级阶层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关注焦点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第一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及其观点陈述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理论与国家政策及其相应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连;而1978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在对前一阶段的阶级阶层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紧紧追随改革开放步伐,借鉴国外当代阶级阶层研究成果,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现实进程,提出了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阶级阶层分析框架,并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解释。尽管对于如何理解、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分化和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一直存在着理论的争论,不同的学者在理论取向、研究模式和具体操作指标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答,或者没有取得共识,比如,阶级阶层的概念如何界定?阶级阶层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还存在阶级或正在形成阶级吗?阶级阶层结构是应该以等级模式还是关系模式来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是“金字塔型”“橄榄型”“倒丁字型”“土字型”或者“断裂”分化?等等。但是,持续的讨论和争论仍在推动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多视角观察和理解我国社会分层领域发生的社会变迁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阶级分析理论与政治分层观

7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即1949年至1978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及一些党内理论家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划分理论。

1. 阶级分析理论:客观经济指标与主观态度指标的结合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引导着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中国社会占据主流的社会分层观。其阶级分析理论主要体现在他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基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通过对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状况的详细考察,分析了各阶级的政治观念和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1]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采用了两种标准的结合: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经济标准即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主要原则。政治标准是指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这是一种主观指标。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也采用类似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并以官方文件形式公布了当时的十三类阶级构成:地主、资本家、开明士绅、富农、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贫农、工人、贫民^[2]。基于这样的阶级分类,政府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打破了旧的阶级体系,消除了原有的剥削阶级^[3]。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之后,1957年至1978年期间,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消亡,新形成的社会分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页。

[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1页。

[3]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北京〕《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5期。

层体系不能再用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标准划分阶级,因此,该阶段的阶级划分标准主要是基于人们的政治身份,即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来划分社会的不同层面。这种社会分层规则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政治分层”^[1]。在这一阶段,阶级成分取代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决定人们阶级身份的关键因素。

2.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6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针对1957年至1978年期间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后来有一些专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构成,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不存在矛盾冲突,而是友爱合作的关系^[2]。

“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阶层分类,遵循的是政治标准和劳动分工(或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原则。直至21世纪初,许多理论家仍坚持以这一模式来划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类构成,只不过在原有的政治标准和劳动社会分工这两个阶级划分标准上,增加了生产资料占有这一分类标准。增加这一标准可以在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之外划分出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两个阶层^[3]。但这又引发了有关私营企业主群体的阶级属性的争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否是一个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4]。经历了改革最初十多年的长期争论,绝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新的阶级阶层群体的出现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当今中国社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马克思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有所不同,他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5]。

二、对阶级理论的反思与新的阶级阶层理论的建构

随着时代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反思这些理论观点在那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和后来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社会政治影响,思考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层现象,由此进入了中国社会学家研究阶级阶层问题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分化的加剧,阶级阶层现象由淡化转为凸显,人们对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讨论也由反思与突破向着重新建构与多元取向发展。

1. 阶级概念消解:多元分层观和利益群体概念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社会学家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马克思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定义的那种阶级,即由是否占

[1]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北京]《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陆学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各阶层”说法的剖析》,[北京]《求实》2003年第6期。

[3]李慎明等:《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阎志民:《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周罗庚等:《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建章:《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北京]《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何建章:《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结构》,[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何建章:《论“中产阶级”》,[北京]《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2期。

[5]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5页。

有生产资料所定义、具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存在阶级利益冲突、矛盾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当年的阶级定义是以生产资料占有作为阶级划分的唯一标准,这只适用于“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中”,而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同时,马克思当年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理论,而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也只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但不适用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1]。部分社会分层研究者认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比一元论的阶级分析理论更适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2],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采用利益群体概念取代阶级概念。

在国内,“利益群体”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顾杰善等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3]一书。采用这种划分模式的学者通常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分化的时代,以往传统的阶级分析无法准确反映出社会群体的关系结构,因为阶级阶层多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而“利益群体”概念能够更好地描述正处于分化阶段的社会群体^[4]。李强认为,利益群体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5]。

2. 从阶级概念转向阶层概念:十大社会阶层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与经济改革以前完全不同的分层形态,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日益明显,人们感受到一个新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在浮现,之前被人们避弃的“阶级”“阶层”这类词汇重新回归公共视野。一些记者、作家模仿当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通俗版本的阶级阶层分析报告^[6],引发社会公众的共鸣,这促使社会分层研究者也开始重新讨论阶级阶层问题,描述和分析新的阶级阶层结构。不过,这一时期多数社会分层研究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只存在阶层而不存在阶级,这些阶层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着等级差异,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但可以协调合作^[7]。

陆学艺研究团队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分类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阶层分析模式。陆学艺等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社会经济分化,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正趋于稳定化的阶层结构,社会成员分化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十个阶层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权力资源的拥有量方面,以及职业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依据职业地位的高低和资源拥有量的多少,十个阶层组成

[1]雷弢、戴建中:《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构想》,《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王煜、雷弢:《社会分层理论——方法论上的选择》,〔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2]杨晓、李路路:《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关于分层指标的理论背景和制度背景的阐述》,〔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庞树奇、仇立平:《我国社会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研究初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

[3]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张宛丽:《近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综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5]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合肥〕《学术界》2000年第3期。

[6]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1997年版;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李春玲:《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国社会分层研究》,〔北京〕《中国研究》2008年Z1期。

了一个高低排列的等级结构。该研究提出的十个阶层分类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拥有量为划分标准^[1]。

3. 阶级结构化理论及其阶级分析理论复兴

与陆学艺等人强调以阶层概念取代阶级概念的取向不同,另外一些社会分层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导致了阶级的形成,出现了阶级结构化现象,应该采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分层和不平等问题。李路路采用吉登斯的“结构化”和布迪厄的“再生产”这两个概念来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已形成稳定的阶级阶层结构^[2]。“结构化”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被持续化和稳定化,从而导致阶级阶层结构的出现,它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地位的差异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即阶级阶层地位影响了人们的流动机会、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再生产”则强调阶级位置的持续影响和代际传递。李路路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社会经济差异已结构化,或者说阶级阶层结构已稳定化,而且阶级阶层结构将被延续下去^[3]。另外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农民工群体时发现,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阶级形成的过程^[4],因此,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重返阶级分析”的思路^[5]。还有一些学者在马克思的以生产资料占有划分阶级的原则基础上,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类框架,并进行阶级关系的分析。如仇立平依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的占有关系,提出了四个阶级的分类: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人员阶级、管理者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者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6]。不过,多数阶级分析理论家认为,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阶级并存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并不意味着会产生阶级对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阶级冲突将走向阶级合作。

4. 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模式的尝试及其修正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提出的阶级阶层分类框架在理论思路和具体操作方法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美国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赖特和英国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家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模式的影响。有些学者直接采用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模式来分析中国的阶级阶层问题^[7],另一些学者则在修正这两种阶级阶层分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切合中国制度特征的阶级阶层分类^[8]。许多研究者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时,都突出了中国特殊的制度特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陆学艺研究团队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虽然沿用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

[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0页。

[3]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北京〕《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4]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5]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上海〕《社会》2006年第4期;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基于学理层面思考的中国阶级分层》,〔上海〕《社会》2007年第3期;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6]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上海〕《社会》2006年第4期。

[7]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李春玲:《过渡时期的城镇社会阶级结构》,〔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张翼:《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器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培林:《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刘欣:《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文化资源划分阶层,在劳动分工、权威等级和生产关系中定位阶层位置,但同时特别强调权力因素和制度分割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中的重要性,认为组织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是决定阶级地位的最关键性的因素,从而分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这一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1]。李路路等则在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框架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工作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提出了以工作组织权威为基础的阶层结构体系^[2]。刘欣则基于产权制度与支配结构基础,构造了一个由17个阶层位置、5个或6个阶层构成的分析框架^[3]。有意思的是,不论各位学者的理论取向如何,最终划分出的阶级阶层类别大同小异,只不过有些学者分类较细,分出的类别较多,而有些学者把细类合并为更少的大类。这说明,研究者在当前中国社会主要存在哪几类阶级阶层上取得了一些共识,只是这些类别可以定性为阶级还是阶层,他们之间是资源占有量多少的等级关系,还是基于权力支配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可协调共处还是必然对立冲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答。

三、超越阶级阶层分类框架的宏观社会结构形态分析

社会学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往往与宏观社会结构研究紧密相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现状和未来趋势,社会学家从阶级阶层分析视角或更广泛的社会分层视角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其中,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最感兴趣的,也是产生影响最广泛的,是有关社会结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的描述分析。这类分析并不局限于阶级阶层分类,而是包括了更广泛的社会分层维度。同时,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还基于对社会分层形态的基本判断,进一步推论社会结构的合理程度、公平程度、现代化程度或社会和谐程度、社会冲突程度等等,进而提出调整社会结构的政策建议。

1. 以制度为基础而形成的“身份等级”社会

前面部分提到,改革开放前一些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社会,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中国社会是由“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所构成。而一些社会学家则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制度化的“身份等级”社会。李强、李路路、李汉林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极其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主要不是产权、收入、职业、教育等因素,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因素(如户籍、所有制、工作岗位管理和单位体制等次级制度),产生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形成了以制度为基础的“身份等级”社会^[4]。这一身份等级结构“是以国家再分配体制为基础形成的结构体系;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是国家自上而下决定性或命令性分配的结果,即国家决定,国家分配,国家协调”^[5]。以制度为基础的“身份等级”社会是中国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观点,它有助于深入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特征。

李强提出的“政治分层”观是这种制度化的“身份等级”社会分层的一个典型表现。李强认为,中

[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05页。

[2]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与组织权威的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3]刘欣:《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北京〕《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4]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李路路,王奋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北京〕《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

[5]李路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国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当时人们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这一时期的政治分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治分层基本不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二是政治分层体系基本上是封闭性的;三是政治地位的社会流动往往发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主要形式有“下放”“戴帽子”“摘帽子”等^[1]。

2. 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进

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进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提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变迁观。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发现,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变迁都经历了由传统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分层形态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橄榄型社会分层形态转变。所谓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指由极少数顶层精英所主导的、贫富差距极大、中间阶层人数较少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贫穷状态的社会分层形态;“橄榄型”社会结构主要指的是一种中间群体占社会总群体多数、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分层形态,这种社会分层形态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理想的社会结构。陆学艺、李培林、李强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会结构形态也将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2],并提出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政策建议。

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观,许多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判断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何种阶段。陆学艺认为,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目前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3]。李强则认为如果只计算城市户籍人口,我国现在已经是橄榄型社会结构了,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农村社会,当今城市的社会分层形态已经接近橄榄型了^[4]。另外,李培林等从收入分配这一角度也考察了这一演变进程,认为如果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两番,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可以初步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格局”^[5]。

3. “倒丁字形”与“土字形”

目前多数学者认同中国社会结构处于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进的过程中,它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型”也不是成熟的“橄榄型”,演进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到底是何种形态,除了陆学艺提出的“洋葱头型”,李强提出了“倒丁字形”观点。遵循着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进的思路,李强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个人在社会分层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其形状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6]。李强认为,我国倒“丁

[1]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北京〕《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4]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上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

[5]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6]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字型”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在当时,主导社会的是“政治分层”结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比如贫下中农,却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丁字型的结构被暂时掩盖起来了。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分层的消解,倒“丁字型”分层结构显现出来。其后,李强又基于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10年人口普查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后进一步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社会结构形态经历了从倒“丁字形”到“土字形”的转变^[1]。

4. 中产化社会、小康社会与断裂社会

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演进,需要培育一个规模庞大而地位稳定的社会中间层,即形成类似发达国家那样的中产化社会。如何扩大社会中间层以促进“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也是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研究者发现,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壮大,但是社会结构形态离中产化社会还有很大距离^[2]。陆学艺认为中产阶级比例达到45%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即中产社会。他估计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中产比例以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预计2020年中产比例将达到40%,趋向于形成中产化社会^[3]。社会学研究者所谓的中产阶级一般是以职业身份来加以认定的,通常是指白领职业者和中小企业主(所谓的新中产)以及个体工商户(所谓的老中产)等。不过,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较为迟缓,制造业和农业聚集大量体力劳动者,制约了白领职业人群比例增长,使职业中产比例达到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后继续增长的速度放缓,“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也面临阻力^[4]。与中产阶级概念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一个社会中间层概念是中等收入群体,它是以收入(或者财富)标准定义的社会中间层,不仅包括白领职业人群,而且也容纳了部分较为富裕的工人和农民,这一群体人数的增长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5]。

与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相关,中国社会学家还提出了中产化社会的一个中国修正版——小康社会与小康大众。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和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不太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随着工业化推进白领职业人群迅速成为就业人口中的大多数而形成中产社会,培育小康大众、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建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现实选择,而作为社会中间层的小康大众有可能像西方发达社会的白领中产那样成为社会整合的“共同的利益基础”^[6]。

与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进思路不同,孙立平针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趋势提出了“断裂社会”的概念。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其表现形态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有时他也称之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

[1]李强:《中产过渡层与中产边缘层》,〔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李培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 and 对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6期;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级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上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刘欣、田丰:《社会结构研究40年:中国社会学者研究者的探索》,〔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3]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发展趋势及其挑战》,〔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5]李培林、戈尔什科夫:《中国和俄罗斯的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和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6]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0页。

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用社会分层研究通常使用的语言来说,孙立平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趋势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少数人处于社会的顶层,控制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资源,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分享很少的资源,而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人数则很少,这种社会容易发生社会冲突^[1]。孙立平所谓的“断裂社会”观点主要流行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 21 世纪之初,当时经济改革的某些措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社会矛盾频发。之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转移支付、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避免了社会两极分化。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未来发展趋势,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同将走向“橄榄型”的小康社会或中产化社会而不是“断裂社会”。

四、结 论

我国阶级阶层研究 70 年经历了固有理论的反思与突破,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争论,多元取向的借鉴与吸纳,本土经验的创新与深化。当前,相关的理论争论还在持续,研究的深化与细化还在推进。对于社会经济分化的群体应该称之为阶级还是阶层,阶级阶层结构的基础是等级性质还是关系性质,研究者的解答日益多元化。多元化解答反映出理论取向和研究模式的差异。大体而言,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可以区分为冲突论取向与功能论取向;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区分为学术理论性研究与政策应用性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产生了不同概念建构和理论阐述。相对来说,偏重于冲突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级概念,更强调阶级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和利益冲突;偏重于功能论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更偏好采用阶层概念,更强调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协调阶层利益关系达到分层现状的合理化与合法化。政策应用性研究更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角度分析阶级阶层问题和社会结构变迁,把阶级阶层研究的理论概念融入政府政策目标话语体系,从而产生更大的政策影响力;而学术理论性研究则更强调相关理论概念的建构,探讨社会经济分化的动力机制。然而,不论哪一种理论取向,哪一种研究模式,其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了解社会分层现象和阶级阶层结构。

[责任编辑:方心清]

[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Lead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Miao Chengbin

Keeping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is the spiritual strength and consistent spiritual identity of the CPC.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value implication, value logic and value realization, we can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CPC's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its advanced political attribute, its lofty political ideal, its noble political pursuit, its pure political quality, and its value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Practicing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and realiz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flect the unity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road, the Chinese power and the Chinese spirit, and the unity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nation.

Research on Class and Stratum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Reflections,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Li Chunling

The 70-year history of class and stratum research in China has largely experienced such stages as reflections and breakthroughs of existing theories, collisions and debates between different viewpoints, reference and incorporation of multiple orientations, and innovations and deepening of local experie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lass and stratum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conflict theory oriented and functional theory oriented; in research model,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cademic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application research. Different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odels produce different concept construction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course, no matter which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r research model is u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ll give us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and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ocial strata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on various levels. Although currently theoretical debates are continu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going deeper and deeper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pecialized.

China'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Test for Its Output and Inflation Effect

Liu Jinquan Chen Wan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the present study selects indicators from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financial institution, financial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combining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a dynamic CRITIC weighting method to construct China's financial st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the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output effect and the infla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ag of monetary policy will lead to the "pro-cyclical" phenomenon of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refore amplify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hock; (2)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financial fragility shock on the actual output is stronger tha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stability shock while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financial stability shock on infla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financial fragility shock; (3)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fragility shocks show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ir impacts on inflation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guarantee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s the dominant strategy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boom, recession and the new normal period. In view of this, departments concerned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obust financial system, guard against the adverse effects